

日本將向何處去

辛尙志

一 悲劇性的性格

日本這一個民族，從其歷史發展的經過觀察，日本民族可以說是一個具有自我性格而缺乏自我精神的民族。性格是有生之類所共有的，如所謂個性、氣質之性之類，精神則係由傳統文化所陶鑄鍛鍊而成，如所謂理性、義理之性之類。一人有一人之自我性格，但未必人人都具有自我的精神。個人如此，國家民族亦然。

在美國未打開日本的門戶之前，日本的大化革新，實際上就是漢化運動；在門戶被打開以後，所謂明治維新，分明就是全盤西化運動。漢化和西化是兩個具有特殊屬性的文化系統，日本人不為漢化，便為西化，這除表示日本人沒有文化的創造能力之意義之外，實在找不出更有利於日本人的理由來解釋。

因為沒有自我的文化，所以亦就沒有自我的精神。沒有自我的精神，所以自我亦就喪失了主宰。自我喪失了主宰，所以只好任憑狂熱的感情，狂馳盲奔，雖死無畏；只好任憑血氣之性格，臨境登場，作悲劇式的演出。川端康成的自殺，是心靈空虛、精神不平衡的結果，而三島由紀夫的切腹，則是感情狂熱、情感不平衡的歸宿。一是靜態的不平衡，一是動態的不平衡，動靜雖有別，而性情的不平衡則一。日本的雙重性格和兩極性的行為，其基本理由即在於文化空虛，中心無主。

一般人常認為武士道是日本的精神，而日本人亦常以武士道自誇，在我看來，武士道只可算是日本民族的性格，而並不可作為日本的民族精神。

。因為武士道的切腹，追根尋底，實在是原始衝動的發洩，野蠻性格的遺形，而並不是經由理性鎔鑄的成品，人文進化的標誌。

二 歷史悲劇的重演

「黃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復回」。就這一觀念上說，歷史是不重演的。然若就「堅往以知來，引古以喻今」之觀念來說，則歷史的重演，又是一項人所共認的事實。「前車覆，後車戒」。後車不戒，終必受歷史的懲罰，於是歷史的悲劇就重演了。

日本是一個暴發戶，淺薄、狂妄、囂張、兇殘，予人以極端厭惡的印象。從十九世紀末葉到廿世紀初期，日本因西化運動的奏功，英日同盟的運用，連勝中、俄，轉弱為強，崛起東亞。自此作惡多端，兇殘肆虐，鞭笞亞洲，梟雄一世。此固為戰技優劣使然，然天假良機，實為不可抹煞之主要因素。因為西方此時正需要僱用一名打手，看住東北亞的缺口，以澈底鎖困「北極熊」的向外奔突，日本適中其選，於是就充當了「西方霸道的鷹犬」的角色，作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幫兇。更巧的是，日本此時所遇到的敵人，都是「弱」者——一個是貧弱散亂腐化的滿清，另一個則是半身不遂的帝俄，天假良緣，日本於焉得以猝然暴發。

暴發戶的心理，喪失平衡，是極其自然的。因其心情之喪失平衡，所以必須向「無限」發展——無限的權力慾望，無限的征服目標。換句話說，就是以無限的意志，提出自我的無限的要求，又以自我的無限的行為，向無限

的夢想奔馳。田中奏摺，就是在這種心理背景下產生，發動侵華戰爭和偷襲珍珠港，亦就是這種無限慾望的自然表現。

我們不必從政治形勢來批判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的荒謬，只從軍事戰略的原理來衡量，就足以證明其瘋狂和無知。

西諺有云：「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其實應該把「日本人填海」補充在後面，不然，風頭都被西方出盡了。

在日俄戰爭中，日本爲攻擊旅順，徵召死客，沉船葬身海底，壯烈固然壯烈，慘酷亦極慘酷，這種以集體生命的自我毀滅的邪招，在有限空間與特定目標，固或可奏效於一時，但在大空間戰略之實踐過程中，則其效果，實在是微不足道。日本抄襲普魯士的軍事思想，對有限空間的戰術，固有所得，但對於大空間戰略，則德日俱茫然無知。不自知其茫然無知，而鼓螳臂擋車之勇，發動侵華戰爭，此即所謂愚者好自用，而鮮有不覆亡者。鼓其一息尚存之餘氣，偷襲珍珠港，冥頑妄作，豈止荒謬，簡直瘋狂！

已故兵學家蔣百里先生，在抗戰初期曾寫出的一部名著「日本人」，開

頭就說：「一羣唱做俱佳的戲角，正在表演一場比哈姆雷特更悲的悲劇！」

不錯，日本終於在大空間戰略的舞壇上，演出一齣「無條件投降」的悲劇——

悽愴無比的悲劇，千古絕唱的悲劇！

天不絕日本，「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我偉大領袖，以德報怨，保持天皇，安全遭俘，放棄賠款，救日本於垂死之時，使其重獲生機；復因我復興基地之安定强大，直接阻遏共匪的擴張，間接則爲日本經濟繁榮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條件。「無中國即無日本」，這是眞理，亦是現實，日本政客豈可有目無珠，熟視無覩？

「談判代替對抗」。尼克森利用矛盾，訪匪訪俄，塑造新的均勢。田中大平，趕學時髦，東施效顰，以急切心情「趕上北平巴士」，負荆請罪，投懷送抱，發表「聯合聲明」，毀棄中日和約，承認匪僞，斷絕與我邦交，這種輕薄卑劣的行徑，對我言，自是忘恩負義，梟獍其心的惡行，對事言，則是莽撞無知的盲動，引魅入室的愚行。孟子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田中已自告奮勇地揭開悲劇的序幕，讓我們拭目

以待吧！

三 平衡戰略的運用

「談判代替對抗」，這是階段目標，亦是平衡戰略的運用。

平衡戰略，並不是國際政治的新事物，在我國，自春秋戰國時代以後，即曾有過卓越而輝煌的表現和成果，如蘇秦之合縱，張儀的連橫，吳蜀的聯合抗魏等是；在西方，因文化關係，出現較晚，其最著名的能手，首推英國

大公約與華沙公約，則是最明顯的硬式平衡。至於所謂中立國、緩衝國，則是平衡戰略的附件，其作用在增大平衡的係數，拉長平衡的時間，減少衝突之外交。平衡戰略，千頭萬緒，難得釐清，就歷史的觀察，其形態大概有二：一爲軟式的平衡，一爲硬性的平衡。前者係基於政治之着眼，後者則係以軍事爲骨幹。如所謂「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就具有軟式平衡的意義，北大公約與華沙公約，則是最明顯的硬式平衡。至於所謂中立國、緩衝國，則是平衡戰略的附件，其作用在增大平衡的係數，拉長平衡的時間，減少衝突的機會。

平衡不能傾覆。平衡傾覆，戰爭就掛上了紅球。要維持平衡，當然就得運用平衡戰略，尤以今日是核子時代，更使這一戰略，突出其價值。

整體有整體的平衡，區域有區域的平衡，整體影響區域，區域影響整體，相互影響，相互衝擊，所以平衡的形式，就從這一個形式，轉化爲另一個形式。目前國際間有一股強有力的意流在激盪——由兩元轉化爲多元，不管這一股意流的成因爲如何，毫無疑問的，這一意流於今後的一段時間內，將支配着整個的國際政治的活動。

平衡戰略既已成爲時代的寵兒，國際間的縱橫捭闔，當然亦以此爲中心，不過，有的的確可以從運用中使其國家獲得利益，有的則從其運用中陷其國家於危殆之境而不自知。一切在人。近代的日本，自來就沒有出現過一個像樣的政治家，二次大戰時期出現過的那般貨色，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不屑一談，目前田中大平又大搞其荒謬絕倫的「匪日關係正常化」，其冥頑無知，實亦一丘之貉而已。

運用平衡戰略，必須與有關方面保持平衡，而後才能在平衡的運用中獵取利益。戴高樂是一個倔強而近乎剛愎自用的將軍，爲增加法國的地位，擺

脫美英的支配，不惜退出北大西洋公約，而採取接近蘇俄的政策，一如以前法俄同盟以對抗德奧然，但當他於一九六六年訪問俄國時，即曾說：「歐洲爲排除美國支配，固需蘇俄作爲歐洲之保障，爲阻止蘇俄支配歐洲，同樣的需要美國作爲歐洲之保障。」其承認共匪的動機，主要係在於藉牽引共匪參與國際政治，以牽制美俄，使法國在多元世界中，擴大其影響作用，換言之，即增加法蘭西的光榮。西德布朗德的東進政策，其政策的基礎，即在儘力避免北大西洋公約國家的懷疑，他深切瞭解，唯有取得西方國家的信賴，才可以加強其東進政策之談判地位，一陷孤立，即跌入深淵。布朗德對「平衡」二字有深刻的瞭解，所以在這一次的選舉中，他仍然保持其勝利的位勢。田中輕薄躁進，對平衡戰略一無所知，若不知自反，則其導引日本再陷於萬劫不復之死地，在邏輯之推論上，實並無值得懷疑之處。

田中搞「日匪關係正常化」，其大錯特錯有三：

一、不明「敵」情 共匪現階段對日的策略，主要在於利用日本，杯葛蘇俄，使發生牽制作用，以緩和匪蘇衝突之緊張情勢。其作法：一則利用尼克森訪匪，以刺激日本嫉妒之情，二則以貿易爲餌，以點燃日本利慾之火，三則針對田中政治慾望，以加速「日匪關係正常化」之具體化、合法化、公開化，四則降低「正常化」條件，大送「面子」，賣弄人情。這是從淺處說，若從深處研究，則可作如下的說法：

(一) 從利用日本，以破壞日俄關係的發展，進而孤立日本，支配日本。
(二) 從拉攏日本，以離間日美友誼，在較爲長期之觀念上，把美國勢力擠出亞洲，進而逼使日本充當共匪反美反俄的打手。

(三) 最後的目的，則是實現其基本策略，赤化日本。

二、不明「友」情 日本在東北亞的情勢中，美俄都賦予他「舉足輕重」的價值。美國自不願淪落爲第二等國家，其亞洲政策的萎縮，只能說是全球戰略運用形式的兌換，而不能說成爲美國自願退出亞洲。若這一推斷不誤，則日本對於美國之國家戰略和全球戰略，實有其不可脫離的因緣。至於蘇俄已超過緩和局勢緊張局面所應有的措施，抑且亦超過解凍活動的常軌，其情鍾一方，投懷送抱的心情，在「趕上北平巴士」的行徑上，已表露無遺。須

知唯有在關係平衡中，才能運用平衡戰略。日本的加速搞「日匪關係正常化」，無疑的就是破壞關係平衡。美國對日匪關係特別關切，所以于七月一日二日要求日本於檀香山舉行首腦會議；蘇俄更不用說，直接與其圍困共匪政策衝突，故其對日外交，由往昔之「笑臉」，頓轉而恢復强硬路線。日本之北方四島與和約簽訂問題，最近均遭蘇俄反制，就是由於田中急切「趕上北平巴士」所致。咎由自取，禍不止此，我們拭目以觀田中悲劇的演出吧！我中華民國，屹立於東北亞東南亞之樞機地位，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對於日本實提供了支援、保障的力量，日本「趕上北平巴士」，片面毀棄和約，斷絕與我邦交，爲盜賊糧，助紂爲虐，捨開道義不談，就以現實利益而論，亦是大大違背了國家理性原則的。

至於東南亞諸國，表面看似平靜，但泰國已揭開抵制日貨的序幕，其連鎖反應之逐步擴大，自是意中之事，尤以日本已往的罪行，在東南亞刻下了刻骨銘心的仇恨，則更加速、加深、加大這一抗日行動的擴張。

三、不明「國」情 日本縱是「經濟大國」，但仍然是「軍事弱國」，「軍事弱國」，就不可能塑造具有獨立性的單一平衡的局面。是故日本要運用平衡戰略，只可就其他軍事強國所造成的單一平衡局面，予以複合性的運用。這是原則，亦是要領。田中對此一竅不通，以脫穎冒進之姿態，企圖獵取後來居上的成果，其不東西撞壁，蓋亦鮮矣。

日本向極偏激，對於世界局勢與平衡戰略，先天上即缺乏深入瞭解能力。這一點，正可供具有偏執狂、權力狂的田中的利用。「重整軍備，發展核子」，使「東亞共榮圈」之夢再現，主觀願望固可如此，客觀形勢，實不容許日本有此危險的自由，不要說共匪，就是美蘇與東南亞諸國，爲應付此一情勢，亦必採取各種不同形式的反制措施，倘日本一意孤行，非「發展核子」不可，則日本又將再度踏入死地無疑。

日本在東北亞的形勢中，其位置價值，並非似英國之對於歐洲大陸，實乃若芬蘭對蘇俄之關係。芬蘭雖中立，但無法擺脫蘇俄的影響、威脅、控制。日本與匪俄之關係，倘無美國之支撑，韓國之緩衝，中華民國之護翼，其不淪爲匪俄任何一方之附庸，蓋亦幾希矣！

平衡最忌偏向一方。偏向一方，即是破壞平衡。這一意義，並非僅指外交、政治、經濟、軍事皆然。田中「脣脣詔笑，病於夏畦」，一心倒向共匪。

懷抱，自謂爲平衡戰略的運用，外交政策的成功，殊不知這一行動，乃道道地地破壞了美蘇平衡戰略的運用。當然破壞平衡戰略的行動，一定會受到製造平衡戰略者的反制。

日本有二條生命線，一南一北。南的是指通過台灣海峽、南中國海到東南亞、印度次大陸和中東這一線。北的是指對美加的航線。有海才有島。島國必須靠海，而海之可靠，則端賴有關國家的友誼的支持，否則，島國的生存已成問題，遑言發展？現階段的日本，在軍事上仍然是「一個「弱」的國家，在資源上，亦仍然是一個「無」的國家。日本的海上力量，不可能護衛其海上航線，固無疑義，然其所以能躋登「經濟大國」的地位，實乃賴局勢的恩賜與友邦友誼的庇護。方今蘇俄大事推行其擴張戰略，其海權已伸張至地中海、印度洋，駁駁乎直向南中國海、西太平洋冒進，倘使日本倒向一邊，破壞東北亞的均勢，則蘇俄之海權，是否仍若以往日俄戰爭時代之一無為乎？至於中華民國對於維護日本南向生命線之意義、關係、作用、價值，則誠不言而喻，不必多費口舌。

誠然，日本對大陸的地理關係，有其特殊的地緣利益，擴展對大陸的貿易，當亦具有特別優勢的地位。方今日本的國際貿易，固受到多方的阻礙杯葛，但若欲以開闢西進的貿易路線，來彌補其他方面的損失，則誠屬「緣木求魚」。原料輸入乎？產品推銷乎？貿易爲國家戰略主要因素之一，貿易必須爲戰略服務。共匪向以陰謀詭計爲其標幟，不要說就其地方條件與經濟條件，無法供應日本之所需，僅以匪偽政權之本質與特性言，亦必使日本難以

得逞。況且蘇俄對匪之政策，乃在極力阻止可能使共匪增加核子能力與工業能力的有關條件的輸入，日匪貿易之擴大，難免涉入此一範疇，一涉入此一範疇，則蘇俄豈能坐視無覩？別的不談，若日本上了共匪共同開發渤海灣石油的鉤，則吾人就不難想像出蘇俄將作如何反制的行動。

貿易是餌，說穿了只是幾根窮骨頭，共匪正在導演一幕「狗咬狗」的活劇。我們看田中這條狗，是否能够把其他的狗咬死咬傷而達到爭得大陸市場的目的。

四 日本將向何處去

由於文化上的邊陲位置，日本對於東方的道德主義，西方的理性原則，似都未曾紮根，所以行爲經常出軌，令人莫測。復由於日本之民族特性，心情偏狹，具有狂熱的悲劇性格，更增強其行爲偏激之傾向，如日本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的倒入納粹懷抱，參加德日義軸心，此次田中的急切心情「趕上北平巴士」，都必須用這種理由解釋，才可得到理智的滿足。

當前的時代，是一個大空間戰略的時代，亦是一個平衡戰略的時代，必須打開胸懷，平衡情感，依道德主義的立場，作國家理性原則的運用，爾後才可在平衡戰略中求發展，從戰略運用中獵取利益；不然，「這羣唱做俱佳的戲角，又必將在平衡戰略的舞台上，演出比哈姆雷特更悲的悲劇」了。

日本大選與內閣改組

朱少先

關係正常化之政策協議，聯合競選，結果在第二次投票中，擊敗同屬主流派的福田赳夫，當選自民黨總裁。（註一）

七月六日田中就任首相之後，根據與大平、三木的政策協議，積極從事對中共建交活動，至九月二十五日即率領大平外相等一行，親自訪問中國大陸，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並且不尊重自民黨「日中國交正常化協議會」